

童年岁月

选自十六篇随笔

1898

……我母亲喜欢自己的膝下，人们常对她的这一慈母情怀阔谈再三。但她实则对谁也恨不起，对谁也爱不上。我的胞妹芳龄二十便兰摧玉折，这虽唤起了她的些许母爱，但直到小妹撒手归西后，她的心中才受到了一些触动，而且这种触动也不是太显见。母亲对我们不大操心。母爱也是一门学问，但她却从未问津此道。孩子们的吃喝，对她说来，更是无关痛痒。她每年花上八英镑雇个佣人，然后将这一切都抛给了那些目不识丁的家仆……这样，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便受不到春晖的沐浴，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以伤筋动骨的代价来对付生活中的困苦，不可避免地受到万千愚弄后，才积得一些智慧……如果我们想赶着一头小牛从大街上穿过，用不着让它到每一家瓷器店都去闯荡一番。简而言之，以现代福利工作者的专业观点看，我母亲既算不上是一位贤妻，亦称不上是一位良母，而只能将她归于有着贵妇习性，又豪放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列。

家父一生贫寒，又无啥建树。他所做的一切都激不起母亲的兴致，而他又无法割舍那令人憎恶的酗酒。当父亲最终掷掉酒杯时，对于改善他与母亲的关系已是收效甚微。人生中，如果没有想像力，没有理想，没有音乐



的魅力,没有美丽的大海和媚人的夕阳,没有我们天生的善良与文雅,我们就难以预卜将会坠入何等野蛮的境况。

母亲常从音乐中寻求解脱。她的音调纯正,有着超凡的女中音的天赋。为了培养这一天赋,她从师于乔治·约翰·温德勒·李。那时李先生任管弦乐队指挥,也是一位音乐会组织者,同时也兼做音乐教师,在都柏林已名声雀噪。他的音乐蹊径独辟,极富创见性。因此他全靠自己培植的业余歌手进行演出。那些职业歌唱家都很厌恶他,而他则将职业歌唱家斥之为歌唱的亵渎者。实际上,他们也都是那路货色。他还把这一批判精神扩展到医学界。更令我们瞠目的是,他只食黑色面包而不沾白色面包,睡觉时窗户洞开。从那时起,我把他的这两个习惯都学到了手,并一直实践至今。最终李先生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并对我们的家庭产生了广远的影响。他使我养成了对学术权威质疑的习惯,而且现在我仍墨守这一成规。

李先生传授给我母亲一种很好的歌唱方法。她活过八十大限,直到谢世时,这种方法使她的嗓子保养得都很柔润,而且他还赐给了母亲赖以生存的目标及信条……

家父是一位爱尔兰新教徒,他属于从下层社会向上奋斗的年轻一代。他没有可承继的遗产,没有职业,没有手艺,也没有任何资格获得一个确定的社会地位。父亲肯定受过小学教育,因为他能读会写,虽然多少出些舛误,但他总算是能胜任记账的差使。观其言语穿戴,他像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爱尔兰绅士,而不像一位铁路搬运工。但他的确没有大学文凭,也从未听他提及过他是哪所小学或大学的毕业生。家父从小到大都认为,所有肖氏家

族的人都天生彬彬有礼。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征服者威廉姆的拥戴者(有着光荣的虔诚和不朽声誉的荷兰威廉姆,而不是那位诺尔曼冒险家),也是爱尔兰的地产商,或与他们沾亲带故。这些卓蹶冠群的后生都来到了都柏林,其中一位在那里建立了皇家银行。在我的髫龄时代,许多老人仍将这家银行称作肖氏银行。这位银行家被授予了从男爵位,并在远离拉斯发汉姆大街的一个名为丛林公园的居民区建立了都柏林肖氏家族。家父是那位从男爵的第二个侄子,得到特许乘马车去参加丛林公园的葬礼。此外他还应邀去那里的一些家庭参加聚会。所有的肖氏成员都是新教徒,也都很势利。

借此势利气焰,家父在屈就了一两次职员后,斗胆放言道,他的家族对国家屡建功勋,在爱尔兰大法庭谋得一席职位,应是理所当然的。后来这个职位被取消,他被一点点养老金给打发回家。此后他卖掉了这笔养老金,又涉足了自己一窍不通的玉米生意。据我推测,他一直到仙逝时,也未获得多少生意经。在稍微远离乡村的地方,他开了一家小磨房。既然磨房中的机器在不停地运转,或许能混出房租。他的合伙人有两个孩子,他们是我的快乐的伙伴。这间磨房的主要作用倒像是专供我们寻乐开心的。

我认为,就新教贵族说来,爱尔兰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不虔诚的国度。我的洗礼是由叔叔做的。当时由于我的教父灌得酩酊大醉,未能到场,教堂司事便受命代他承诺宣誓。这就像我叔叔命令他向教堂的火炉中添几铲煤一样随便。我对宗教从未达到坚信不疑的境界。我觉得,我的高堂也是如此。对于英国家庭举行典礼的庄严

性我所知甚少。因为那时爱尔兰新教主义还称不上是一种宗教：它只是政治争斗的一个侧面，一种阶级的偏见，一种对罗马天主教的定罪方式，说他们是社会中很低劣的人，死后会被排斥出新教徒的行列，被打入地狱中去。天堂只能为新教徒的绅士淑女们所独享。在童年岁月，每个礼拜天，我都被送往一所周日学校。在学校里，那些假斯文的孩童嘴中絮叨着经文，并能获得签字的小卡片作为奖赏。如此这般折腾上一个小时后，我们就被赶进临近的一家教堂（上利森街的摩利耐克斯教堂）。在那儿，我们围坐在圣坛的栏杆边，个个如芒刺在背，大家都衷心盼望着仪式速速结束。我忍受这些，不是为了寻求自我的解脱，而是父亲的脸面要求我这么做。当我们迁居达尔客后，就把这一切仪式都付诸东风了。而且以后再也未曾染指此道。

劳动人民从来无暇涉足教堂，这是促使它成为一切社会罪恶的温床的原因。在英格兰，教士们常步入穷人的圈子，徒然地劝说他们走进教堂。在爱尔兰，穷人都是天主教徒（我的祖父奥兰治称他们为天主教徒）。新教教堂跟他们毫无瓜葛。我不能说，在我那个时代，爱尔兰新教徒的状况比他们描绘得还要糟，我只能谈及一些自己熟悉的片段。

请读者诸君设想一下，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连一件蔽体的破烂衣衫都被贫困剥去，而小人们还不停地向你灌输要鄙视劳力者、要敬重富绅！再请您想一下，小人们就在你的耳边鼓吹，只有一个上帝，天堂只属于新教徒和堂堂正正的绅士，要反对那个被人盲目崇拜，称作教皇的大骗子！还要请您再想一想，英国贵族们为

依靠中产阶级的收入而苟存所编造的种种托词,您感觉如何呢?我记得,有一天斯托福布鲁克告诉我,从我的书中,他看出了我对社会的不可遏制的藐视和憎恶。这难道还很奇怪吗?

如果在童年岁月,没有遭受过这种种不公的磨折,我对这一套或许还能压住心头的怒火。对一位局外人来说,这可能是不足挂齿的。这些只不过是 在一个天主教国家里,一群悲凄的新教商人所上演的一幕喜剧。这群商贾聚集在由证券经纪人、医生和土地代理人组成的富豪集团的麾下,还有一群地主劣绅为他们作掩护,这群土豪因债台高筑而无法逃往伦敦,但他们有一位遭流放的副王做大帅,该统帅只能屈就皇家陆军中尉这样一个职务,年薪两万英镑。这笔钱仍使他感到囊中羞涩,但却无碍他将娇妻封为副王后。那帮人就在他的帅旗下,扮演着达官显贵或宫廷大员的角色。那种种虚伪,再加上对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串串谎言,他们已将生活中的真情实意彻底丧尽。

现在,我是从爱尔兰的宗教中发现了何种力量,才将自己从孤寂烦恼中解脱出来的呢?这很简单,那便是艺术的力量。母亲恰巧就有着卓萃冠群的音乐天赋。为了能认真地培养这一天赋,她就得同其他有音乐天才的人交往。她的声音同其它一些最悦耳的嗓子共同演唱的伟大作品,令人不可思议地奉献给了罗马天主教徒。这一事实引发了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帝是否真正是一位好的新教徒。甚至连那些神圣的名流绅贵们的身份时下也成了 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因为有些歌手,无可否认只不过是些区区小店主而已。如果最优秀的男高音,必

定是一位天主教徒，身份至少需是一位会计师的话，那么一位滑稽演员的身份至少也得是一位诚实的文具商了！

如果母亲不想只呆在客厅里，唱那些民间小调，她就必须摒弃一切宗派意识，丝毫不受信条或阶级身份的羁绊，毅然去和那些具有相同艺术天赋的人们交往。她也必须允许罗马天主教牧师进入她的生活，也要敢于接受邀请进入无赖汉的家庭或天主教堂，去演唱莫扎特的弥撒之歌，否则她的一切努力就都于事无补。如果是宗教把人们捆绑在一起，那么漠视宗教的观念又使他们分裂。那么我必须证实这一点，在音乐天才的身上，我发现了我们国家的宗教所在，而在我们的教堂和客厅中，我却发现无宗教可言。

轶事一则

选自《我是谁及我所想》

1901

(十六篇随笔)

……我给诸位讲一个家父的故事。孩提时代，有一天，父亲将我带到基林海湾，他成了我游泳的启蒙老师。他的开场白是有关学习游泳的重要性，讲话陡然进入高潮：“当我刚满十四周岁时，游泳这一招使我救了你罗伯特大叔的一条命！”看到我已经被他的话深深打动了，便弯下腰，冲着我的耳朵很自信地说道：“拉勾到家的话吧，学会游泳后，我生活中的一切就都一帆风顺了。”说罢，他便一头扎进大海里，随心所欲地游了个够，精神为之一爽。在回家的路上，嘴中老是咯咯笑个不停。

现在我写作品，从来无意使用突降法，总是让其自然地向前发展。毋庸置疑，我写喜剧的方法及其在剧院中所产生的逸乐效应，和家父咯咯的笑声之间，还是丝缕相连的。

肖伯纳论肖伯纳

选自《弗兰克本该如何做》

1919

(十六篇随笔)

此公印刷自己的书籍时,拒绝使用撇号和引号,理由是这些符号有碍观瞻。并放言,如果《圣经》被这些不堪入目的符号所污损,它在文学上便永远难以达到那种登峰造极的境界。他对语音和速写饶有兴致。在轩敞的礼堂里做公开演讲时,他的音调中弥漫着学究气,每一个字眼都有使听众火冒三丈的特效,因此他的演讲广受听众欢迎。他鼓吹计算时,在公制中再添上两个新数位,也就是将十进制和十二进制结合起来,顺序应该是:八、九、西、西一、十和十八、十九、二西、二西一、二十,以此类推。像孩童喜爱玩具一样,他对各类机器都很着迷。有一次,他还差点儿买下了一台根本用不着的现金出纳机。当他快步入花甲之年时,禁不住摩托车的诱惑,便飞身上车,一气疾驰到离工厂七十七英里的地方。在折回到自家门口时,他来了个急转弯,结果摔了个狗啃泥。不论阴晴,他坚持一年到头都在斯普坦洗澡。人们一直指责他是那群洗澡的疯子中最癫狂的一位。他的这一创举是有习练基础的。无论冬夏,他每天早餐前都要到“皇家汽车俱乐部”的游泳池去游泳。作为一位爱尔兰人,他讨厌洗澡,但又禁不住扑通一声跳入冷水中的刺激。据说这便是他

这样做的理由所在。全世界妇孺皆知，他是一位素食主义者，把健康看得至关重要。但他又大放厥词，那些刻意追求健康的人，哪怕只沾得一点点便宜，却已是生活在了崩溃的边缘。他坚信，所有的大忙人，每隔四十年都要蒙头大睡十八个月，以便恢复一下体力。虽然我满可以将他的这些狂热的想法再涂满一张纸，但只得割爱了。

关于肖爱向女人献殷勤的说法，多是子虚乌有的。他是说过，世界上真正有事做的男人，在追求任何东西时，都没有像追求女人那样花上那么长的光阴和那么多的金钱。他这话说得倒也没有离谱……由于同女人接吻时，他是一位十足的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那简直是没说的。世上也无人知晓他这方面的老底。他显而易见是一位模范丈夫。他的青春岁月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度过的。那时，并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一言半语的丑闻。但是一位大腕的舞台监督有一天在排练场对一个风致韵绝的女演员说的一段话，却是肖的一则流传千里的轶闻：“咱们再给肖剧加把劲吧，让他充满生机与活力。”女演员痛苦地失声说道：“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千万别再加什么劲了，他已经败坏到了这份上，你如果再给他加上一把劲，全伦敦的女人可就都要遭殃了。”……

一件轶事

选自《回到梅斯勒》前言

1921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在古老的布罗莫顿礼拜堂的一间斗室里，我同艾迪斯神父进行了一场辩论。他的一位同道把他请来，试图劝服我皈依罗马天主教。神父说，宇宙是存在的，一定是某位创造了它。我接过话把儿说道，假如某个人存在的话，肯定有人先创造了他。神父接着说道，为了便于讨论，我姑且承认这一点。我也可承认你是上帝的创造者，甚至是上帝的创造者的创造者。我可随你的意，承认你是喜欢多长就多长的一个队伍的创造者。但是这样无限度地多下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这样也很浪费。既然在他身后再加上多少都不能解决你的逻辑推理方面的困难，信任第一个创造者并不比信任五万或五千万个困难多少。为何不干脆接受第一个，接着就打住呢？我插嘴道，请原谅，要我相信宇宙是自创的和宇宙的创造者创造了他自己，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比这还要简单得多。因为宇宙显而易见地存在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在自造着，而关于宇宙的创造者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诚然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简直无法再深入地讨论下去了。他站起来说道，我们两个人活像在拉锯，他向前推，我却向后拉，结果啥也锯不着。但当我们放下这个话题向餐厅走去时，他

又旧话重提，思忖片刻后说道，假若他丢掉了自己的信仰就会变成一个疯子。虽然他显见的虔诚也触动了我的恻隐之心，但我却仍因年轻气盛，而陶醉于那种喜剧性的气氛中，感到飘然惬意，于是也就阔谈了那么一通。

学 钢 琴

选自《伦敦音乐》弁言

1935

……虽然父亲和我都不会弹钢琴，但母亲变卖艾奇街的家具时，从没想到要卖掉我们家的那架钢琴。同母亲一样，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她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一生中第一次有个寥寥数日的假期来伦敦看我们的几天外，母亲将永世难得和他再见面了。当初要不是他们权宜凑合的话，也就不大可能上演祸起萧墙的悲剧了。从小我在家中就饱受了音乐的熏陶，须臾之间，发现家中的音乐没了踪影。除非我自己动手弹上几下，否则就是寂无声响。我买了一本威尔的手册，书中有键盘的图解和有关乐谱的解释。我还在别的地方录了些音，有空便自修钢琴。我不是从东尔尼的五指练习法入手，而是从旦·吉尔万尼的序曲开始练习。我觉得最好从一些熟悉的内容开始，这样容易听出手指是否按对了琴键。在我们的公寓有大量的歌剧和声乐乐谱。虽然我学习钢琴从未得到过多少技艺，直到今天，也不能潇洒自如地弹些音阶，但我却获得了我要学到的知识：我能唱出总谱并能够理解，这就如同我曾听过母亲和她的同道们对它进行过排练一样。我驾驭管弦乐的能力比对付钢琴曲要高过一筹。最终我能够谙练地弹出（知道应该怎么弹）那时的一些老掉牙的伴奏曲，同众多技艺

精湛的钢琴家相比,我的演奏倒还更能博得歌唱家们的青睐。后来我又买回了更多的谱子,其中劳拿格瑞恩的一首曲子使我对瓦格纳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还买了许多由贝多芬交响乐改编的钢琴曲,发现这些曲子的音域已超过了歌剧和圣乐。后来,为了习练经典交响曲和序曲,我就同在伦敦的妹妹一起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以钢琴二重奏的形式弹奏低音曲。我弹奏过贝奇的《创造》和《赋格艺术》,还埋头钻研过学术性的教科书。在一位叫格雷门特的风琴手朋友的指导下,进行和声及多声部的练习,努力克服那些连续不断的五度音及八度音,脑袋中对所弹奏的效果如何,却是一片茫然。我还阅读了有关和弦原理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虽都是些伪科学的滥调,但高等学校中想获取音乐博士的学子却必须将这些论文生吞下去。我还弄明白了,斯丁纳的被认为是常识性的观点会让学子们在牛津名落孙山。奥斯雷的那点只供卖弄的学问,会使学子们在剑桥榜上无名。我还读过莫扎特的《明快和音曲》(这不过是他为弟子苏斯莫尔潦草书写的一张破纸,上面倒还有几点有益的提示)。许多年后,爱德华·艾尔戈告诉我,这是现存的对学作曲的学生惟一有涓滴用途的文字。很遗憾,我那时虽已不再是一位年轻的作曲家了,当时对我却没有起到半点作用。然而最终它帮助我学到的音乐方面的知识超过了任何一位作曲家的大作。对一位批评家来说,这点知识无论有多么贫乏,还是一点应该学到手的看家本领。在那段时日,当我的确变得有点想卖弄学问时,碰巧翻阅到了李过去写的《丹·吉奥沃尔尼》,发觉他将莫扎特作品中所有重复的内容都剔除了,这些都是他以奏鸣曲的形式信手涂鸦

的产物。时至今日，我仍对当时受到的震惊记忆犹新。我现在明白了，李在那次改革中，比他同时代的人超前了一个世纪。我同时希望有朝一日能听一场莫扎特的《依德门尼澳》的演奏，其中不要含任何一点重复过两次以上的内容。

每每当我回忆起学习期间强加于他人的砰砰声，口哨声，咆哮声，甚至嗥嗥叫的噪音时，便全然被徒劳的悔恨所吞噬。但除此之外，我在那个年纪还能做些什么呢？现在已经有了无线电，它能让我在一周内听遍整个欧洲的优秀音乐。而在以前，我如果想听的话，就需花上十年的光阴。在经受了五年的办公室苦役般的洗礼后，我搬到了在伦敦的母亲那儿，和她住在一起，共同度过了二十个春秋，一直到我成家后才离开。我那时最喜欢的瓦格纳的《铃声》，竟然几乎让她变得发疯。对她来说，全是“宣叙调”，一听就会毛发倒竖。可那时她从未当面抱怨过，到我们分开时，她才袒露了这件事，并告诉我，她有时还会跑得远远地去放声痛哭一场。每当我想起这事，便心如刀割，即使我曾犯过杀人的弥天大罪，感觉也不过如此痛烈。若能重活一次，我将全身心地投入去研制耳机、话筒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把音乐狂们制造的噪音完全封闭在他们自己的耳朵中，独自去享用。在德国，开着窗子弹钢琴是违法的，但这种法条对同一屋内的人又有什么作用呢？除非是自己在一间完全隔音的房间里弹乐器，否则全该治以重罪。连那些大声喧哗者，也应受到嘴巴没收充公的严惩。

肖伯纳的学校生活

选自《错爱》

1910

……家长主办的业余性的私学中无力解决的问题，到了大学校中有组织的专业化机构中，就可能迎刃而解了。那些学校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于是，如果家长能付得起钱，便将孩子托付给这类专业化的学校。他们是将孩子送进了学校，但总的说来，世上没有任何一隅能像学校一样，让那些天真的人儿深感惴惴不安了。首先说，学校堪称是一所监狱。但从某些方面看，它甚至比监狱还要残酷有加。譬如，在监狱里，你不会被迫去读狱吏和监狱长写的书（诚然，如果他们能写出可读的书的话，就用不着在那里当狱吏和监狱长了），不会因记不牢那些根本无法记住的内容而挨打或备受挫折。在监狱里，无人强迫你去听那些连讲演者本人也不理解、不关心的味同嚼蜡的演说，因此也就没法子让你去理解和关心。在监狱里，他们可能会让你受皮肉之苦，但不会折磨你的灵魂。他们会保护你免受别的犯人的暴虐和凌辱。在学校里，你却得不到半点这样的优待。全世界的书架上都摆满了令人鼓舞入迷的书籍，这些都是上苍赐给的宝贵的精神食粮，学生们却被迫去啃那些富有欺骗性的骇人听闻的教科书。那些书全是由不通笔墨的人炮制的，人类中谁也难以从中学到任何知识。你即便能将这些书解



释得头头是道，却无法通过阅读这类东西，而获得一些裨益。强迫学生去读这些书本，结果是让他们以后瞥见书本就感到恶心。如果你的环境中有着美不胜收的健康而有意义的事物：有着群山谷壑、莽莽树林、群鸟翱翔、河水湍湍、鱼翔浅底，还有阵阵和风及清新空气；或是出门是繁华的大街，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商店橱窗里的货物琳琅满目，乐事纷至沓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却被迫呆在一间陈设简陋，没有人情味的房子里，这种房子简直就和牛棚没有二致，而且还是和一大群孩子呆在一起。一开口讲话，就感到沮丧，一举手，一投足就觉得晦气，回答不出一个愚蠢的问题就感到狼狈。即使你逃离了这个牲口棚，远离了你的“看守”的目光，你仍会感到凄惻殷殷，再也不忍目睹那些令人憎恶的伪劣的教科书，甚至都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你对“看守”和用鞭子抽你的人的满带稚气的憎恨，同他一个大人对你的憎恨相比，你对他的憎恶就是小菜一碟了。为了糊口，他像一个奴隶一样，去容忍一个班级。当你知道了，你是怎样在蹂躏老师，他又是何等地憎恨你时，心里就感到很不平衡。你就会煞费苦心，以狡猾的诡计并心怀恶意去做那些禁止做的事，使老师感到十分气恼。难怪老师有时会被招惹得像恶魔般地勃然大怒。甚至像约翰逊博士这样爽直的人也得承认，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将孩子们狠狠地揍一顿。他们为逃避挨鞭子，才肯拼命去记住一些单词和词组，否则他们啥也装不进脑袋去。这种教育简直是一种用言语都难以形容的恐怖的勾当。

现在我常听到抗议的声浪四起。起初，我的老师或是他们的幽灵们问我，在学校是否被痛打过。我回答说



没有。那么我在学校就是没学到一点知识了。约翰逊博士的老师或许确实特别关注他是否学到了一些知识,所以便野蛮地打他,结果是将他的灵魂致残——因为约翰逊的伟大的灵魂的确是因学习功课被致残了。无论我的学业优劣,我的老师们都不太责骂我(更加公正地说,或许他们的雇主不太喜欢责骂这种做法,也没有授予他们开除我的权力)。收进学费才是学校的真正目的。我没有学习学校的功课,因为手头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去做。我没有和那些文学傻冒们在酒水中浪费光阴。约翰逊本该以他动地撼天的精神摇撼整个英国,他却将自己泡在了酒馆里。我接受的教育对我百害而无一利。这简直就活像拖拽着一个孩子的灵魂在泥淖中前行。我躲开了约翰逊和卡莱尔的作品,也有幸没去碰过斯克尔和卡雷尔的大作。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未曾染指过他们的作品。而且我们并没有因受到胁迫就去学习。我们用撒谎、欺骗、猜测和运用智谋去躲避惩罚。当这些伎俩都不灵验时,便乱耍诡计,弄不好就会吃关禁闭的苦头,“关进去”是那个时代的一句口头禅,或是被某位老师用藤条抽一顿。当我们能承受住这种肉体的折磨,并能蔑视这种耻辱时,老师们就感到十分自豪(不允许老师对我们打得太重)。老师们本该这样教导我们:宁愿去死,也不该这样苟安忍耐。一方面存在着懒惰和羸劣的行为,另一方面又以具有高压手段自擂。这两种货色变成了可卑的家常便饭。如果老师们不是为了挣点辛苦钱养家糊口才肯出面阻止我妨碍别的年龄较大的学生学习,要是他们真的要履行对我的教育职责,早就把我轰出了校门。老师说我对学校一点也不忠诚,丝毫没有要学习的想法。我

老是嘲弄搅扰那些的确想学习的孩子,而且爱撒谎,开小差,是一个具有煽动性的小讨厌鬼。在这种情况下,让我继续留在学校里,只会使我的行为变得更加败坏,也会进一步降低老师的职业名誉。但为了达到被学校开除的目的,很有必要犯上一次弥天大罪,这样其他孩子的家长就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和这样一个少年犯呆在同一所学校里,而会发出威胁,很快将自己的孩子撤出去。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位寄宿生,受到了这种惩治的威胁。这名小罪犯吻了一位女仆,没准他是一位英俊少年,是女仆吻了他呢。反正他没有吻我,也就无人梦想着要开除我。一个孩子在学校呆一年对学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那个少年犯又被违心地留在了学校里。这也是为什么开除他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他自己都是一种胜于言表的解脱,而他却依然留在了学校。

如果采取非商业化的态度办学,将所有的不忠实的废物及懒虫都严厉地驱逐出校门,学校不但不会变得冷落,反而会变得更加充实。或许人们对这种观点会有争议。要以很诚实的态度办学也是断然不可能的。和学生们的相比之下,老师对学校更加痛恨有加。这就像要囚禁一名犯人,也就不得不囚禁一名看守一样,要由看守保证犯人不致逃之夭夭。由于惧怕失业饿肚子,看守被牢牢拴在监狱里,如同犯人被门闩和篱墙给禁锢在监狱里是一回事。所以这些可怜的教书先生,领着微薄的薪水,还教着庞大的班级,像我们一样,都不过是囚徒而已。况且他们负有更多的责任,更加愁肠百结。他们不敢将自己的英雄态度强加在雇主头上。如果他们有着牛劲十足的习性,那就难以获得教席。教师最得天独厚的一点是,他

们受人雇用，只是临时性的，他们盼望着能逃离讲坛，登上圣坛。他们中的佼佼者，或是特别缺乏耐性的人，常被那些笨拙、愚钝、邈邈的孩子给惹得愤然作色。这些孩子实则需要悉心关照及耐心指导，结果老师们常野蛮地对他们横眉竖目。要想使这种孩子陷入机彀或使他们感到困窘，寻个借口对他们施以惩罚，这如同是探囊取物。

就我个人的情况说来，在学校学习的结果也是我始料之中的。我的学校只对修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有点最低要求。我开始入学时，还很矮小。我叔叔在我入学前，教了我几个星期。我知道了许多拉丁语语法的知识。我在学校里学了几年后，叔叔对我测验了一下，他发现，我在学校学习的最终结果是，我已忘记了他传授给我的那点知识，其它啥也没有学到手。直到今天，虽然我还能把一个拉丁词变格，以毫无意义的方式重复一些词形变化表，因为我把这些词不达意的韵律都已烂熟在胸，但我从来也不能把刻在碑上的碑文从头至尾翻译出来。对于希腊语，我只能辨认出大多数的字母。但就文科学习而论，一言以蔽之，我就是莎士比亚第二。我能像读英语一样，熟读法语，如果需要，我可以解释出几页德文的意思，也能读一些意大利语歌剧。但这些都不是老师在学校里教会的。我在学校学会的是扯谎，可耻地屈就暴虐；听到的是下流的故事，用淫猥的笑料去亵渎爱和母性；还学会了绝望、逃避、嘲弄、懦弱以及一位胆小鬼恫吓另一位胆小鬼的卑怯的手段。如果我不是一位爱尔兰的走读生，而是英国公学的一位寄宿生，可能还得再多学到一些这类货色，那会使我更加感到汗颜。



选自《十六篇随笔》

……在所有的学校及大家庭中，势必都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常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我对这类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现在的学校比家庭搞得还要糟糕。我写作的此时此刻，眼前就放着一封信札，是爱尔兰修道学校的一名聪颖的女孩写的。她自豪地列出了她的学校中不同的教育分支，以不同的语言同时开设的九门课程。真要完成每一门课程的要求，这需要一位像牛顿一样的天才干上几个月的时间。我对这样的课程表只能瞠乎其后。有的人认为早熟教育对学生的压力过大，但我并不是站在这些人的一边煽动反对这种教育。约翰斯多尔特·米尔幼小时，他的父亲詹姆斯·米尔就教他学习几门已死亡的语言。我听说，威廉·莫里斯曾将詹姆斯谴责为大怪物。对于这种做法，我深感费解，约翰自身也是如坠云雾。时下有人认为，在富庶的公学学习的学生，如果能够阅读拉丁文，能解二次方程，便算是受到了良好教育。我无心对这种假设作辩护。很显然，一个学生即便能读懂拉丁文，也能解二次方程，但他仍可能是一个无知愚氓式的公民。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一个学生通过填鸭式教学辅导，获得了一纸大学文凭，那么他一辈子也不会再去碰一页拉丁文，甚至连想一想都会感到生厌。自己算账时，也只会用那点最简单的算术知识来对付。然而，我所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事实：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不管日后从事多么富有哲理的思

考,心中所记得的都只是在童年时代所学过的词汇变化表。六岁前我所学过的乘法小九九表,十岁前学的拉丁文的变格及动词的变化形式,直到九十二岁的今日,依然谙熟在胸。然而到了成年,当我再去劳神学习现代语言的类似变化规则时,却是一败涂地。因此,我告诫学生们,没有必要把时光浪费在不规则动词的学习上(如西班牙语中的不规则动词),但要经常开口说话。西班牙人听了也许会捧腹,但他们能够明白,只有多说才是万全之计。当一个英国孩子说“我赏”和“我出”时,就像说“我想”和“我去”一样好懂。洋泾浜英语同弥尔顿式的英语一样有用,而且更为简洁。我们以狂热的态度去鼓噪有关正确的标准,每向前迈一步,简直就是一种应受惩罚的道德犯罪。这耗尽了 we 经年的生命。尽管有许多方法摆在我们的面前,但直到其中的两种被分别冠以正确与错误时,我们才肯择取其一。其中正确的一个,常被我们弄得异常难,而错误的一个又常是最简洁易行的。